

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
SERIES OF POLITICAL AND LEGAL THOUGHTS



政治世界探微

任东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政治世界探微

任东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世界探微/任东来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

ISBN 7-301-08686-5

I. 政… II. 任… III. 国际政治-文集 IV. 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1390 号

书 名: 政治世界探微

著作责任者: 任东来 著

责任编辑: 邓丽华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686-5/D·110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2.75 印张 507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政治：难以摆脱的公共空间（代序言）

年轻时代，一腔热血，自然会热衷于有“改天换地”之功能的政治。为此，在198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还专门为一次全国性的研究生代表会议写过一篇《论研究生从政》的交流文章。现在，文章早就没有了踪影，但其中的主要观点居然还历历在目，主要是说国内大学的传统一向是好学生留校当老师，一般的学生才到社会的管理部门。为了实现现代化，应该改变这一情况，鼓励好学生从政，优化公共管理者的素质，提高管理的现代化水平。现在看来，这样幼稚的想法不过是“学而优则仕”的现代版。虽然谈起问题来津津有味，但轮到自己的头上时，却成为了好龙的叶公。第二年毕业时，我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推荐到团中央的国际部工作，但到最后关头，却临阵变卦，考了当时还相对稀罕的世界历史专业的博士生。由此，走上了一条从事学术研究的不归路。当时，安慰自己的选择的居然是美国政论大家李普曼的一句名言：“学者想要控制政治，结果是政治控制学者。”

二十年过去了，虽然自己一直远离政治，但政治却总想控制我。所以，在特定的社会中，李普曼的话应该改为：“即使学者不想影响政治，政治也要控制学者。”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翻检自己过去的学术文字时才发现，政治这一主题居然是惟一可以贯穿我不断转换的学术兴趣的一条主线！不论是研究大国的外交，还是研究国际体制；不论是研究一般性的族裔冲突、民族自决，还是具体的宪政法治；不论是讨论宏大的国际事务，还是学术界茶杯里的风波，其实质问题都是权力的获得与使用，利益的分配与协调，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而这些恰恰是构成政治的基本要素。

仔细想来，这实在也不奇怪。所谓政治不过是个体赖以存在的被管理的公共空间而已。对个人来说，这个公共空间可以从所处的小社群到

神圣的民族大家庭;对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这个公共空间可以从一个具体的国际组织到抽象的全球社会。由于个体注定要存在于某种形式的公共空间,故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称“人是政治的动物”。用政治来界定人与非人,足见政治性乃人的本性。从历史来看,也的确如此。人类的形成和发展几乎与政治难舍难分。在人类的早期,因为自然环境的残酷,个体不依靠群体便无法生存,于是就有了群体合作,有了氏族社会,有了公共空间,有了公共权力来管理公与私的关系,也就有了政治的最重要的含义——权力。有了不同的氏族,人类不仅面临来自自然的挑战,而且也面临来自同类的挑战,为了争夺有效的生存资源,人类之间就出现了仇杀,于是就有了“我们”和“他们”的身份确定,“我们”可能从氏族发展为部落及部落联盟,最后成为国家。他们可能也遵循同样的途径成为另一个国家,于是政治便有了另一种含义——确定和构建身份。国家只是最后的身份,而在国家内部,因出身、血缘、地域、职业和地位不同有着不同的人群,而有限的公共资源不可能得到平等均分,即便是弱肉强食,也还是需要某种秩序,于是政治有了第三种含义,秩序的政治。而源自五百多年前哥伦布等人航行和探险的西方扩张,又把世界上所有孤立和分散的民族与国家,裹挟到不可抗拒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之中,形成了一个日益紧密的国际社会,出现了与国内社会一样拥有政治诸要素(权力、身份和秩序)的世界政治。

本书集中的文章,就是从这些不同的侧面或者说维度来说明政治的内容、本质及其意义。第一组文章讨论和评析的是西方(美国)学者有关世界秩序与国际制度的理论。全球化使全球治理日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如何使世界秩序与国内秩序协调发展,如何维持国际社会起码的正义,需要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

尽管国际制度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当今的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和行为主体依然是主权国家,而其中大国的政治外交对国际制度和其他主权国家施加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后者对大国的影响。这个世界依然是大国主导的世界,因此,探索和理解大国的国际政治行为成为第二组论文的主题。

世界大国关系中,对中国最为重要、同时也存在巨大挑战的无疑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这一关系充满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两国

的合作和敌对不仅直接影响到两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而且也波及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探究中美关系的政治后果及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是第三组论文试图努力的方向。

虽然主权国家常常等同于民族国家,但世界上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极为罕见。在国家主权和领土被认为不可分裂的传统国家观依然占主导的情况下,欧洲近十年的发展却让人眼花缭乱。在中东欧地区,多民族国家的分裂居然成为冷战后的新景观,而在原来的西欧,却出现了与此裂变进程完全相反的聚变(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一向以民族大熔炉自居的美国则出现失去民族同一性的担忧。理解这些涉及民族或族裔政治的难题是第四组论文的工作。

一般的看法是政治决定了法律,但殊不知,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中,经常看到的是法治特别是它的最高体现宪政,界定并规范甚至改变着政治!这一切如何成为可能,是我近年来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第五组论文就是这些思考的初步成果。

作为学界之人,不仅时时刻刻受到外在政治有形和无形的挤压,而且还面临着学术共同体内部政治的束缚。高智商人物云集的学院,其政治的复杂性与其中人物思想的复杂性相辅相成,以至于对国际政治烂熟于心的大师级学者摩根索感叹说,“最复杂的政治莫过于校园政治”。最后一组文章部分地涉及了学术中的政治以及政治中的学术。

这些文字,都是从过去十多年中所发表的上百篇学术性文章中所选择出来的,基本上基于三个标准:一是专业化论文注意其原创性,二是评论性文字突出其可读性,三是已经综合并编入到作者已出版著作的文章尽量不收。就文章的性质而言,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根据解密的政府档案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以期填补国内外这些课题的研究空白;二是基于公开的官方文件进行的政策研究,力图对现实问题进行客观的学术分析;三是对有关学术著作和学术理论的评论和解析,帮助国内读者把握一些较新的学术著述和思潮。所有的论文都是围绕着某一具体问题、概念、著述、理论和机构展开的,是地地道道的“探微”之作。为保持原貌,收录文集时只对文章作了必要的技术性修改,恢复了最初发表时被编辑删掉的某些部分。每篇文章后面均注明了原始出处和最初发表的时间。

这些文字,不论是历史问题的研究,还是现实事务的讨论,或是对学术研究本身的评论,涉及的虽然都是广义上的政治世界的议题,但基本的出发点却是纯学术的旨趣,这也是为什么文章类型多样、议题广泛的主要原因。本着求真和创新的原则,从本人学术兴趣出发所选择的这些研究或评论题目,基本上是学术界没有做过或做得很不够的题目,并尽可能地发掘新材料,尝试新方法,小心求证,努力寻求历史内在的真实和逻辑解释的完备。

任东来

CONTENTS 目 录

第一部分 政治的国际制度维度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理论	3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际体制理论	16
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	30
从相互依赖到全球一体:基欧汉和奈的 新研究	39

第二部分 大国政治

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 ——以美国为例	49
劈沙沥金求真相 ——读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 与朝鲜战争》	62
作为冷战历史的战后美国外交 ——略评《战后美国外交史》	74
二战中瓜分巴尔干的大国角逐	82
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 ——对于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 (1944—1946)	98
从“两大阵营”理论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看法 和政策的演变	116

凯南:从遏制到缓和	128
冷战后东亚地区集体安全体制初探	133
形成中的美日轴心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139
人权外交:内容、基础及公民自由问题 ——兼评毛寿龙《美国的人权外交: 是保护人权还是侵害人权》	143
对人道主义干预的考察和思考(提纲)	148

第三部分 中美关系的政治

白银外交和币制改革:绝处逢生的 “双赢”游戏	159
陈光甫:一位被遗忘的外交家	166
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	175
中国的大国地位:成败皆在 1943	194
1941—1949 年美国在华军事机构 及其沿革	199
批判《中美关系白皮书》背后的政治	217
探求中美关系的历史谜底 ——评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 1949—1972》	221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 中的台湾问题	234
中美两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由来	243
脆弱而有韧性的关系:中美关系中紧张 与和缓的变奏曲	249
小视角下面的大历史:中美关系中的 两个 23 年	253

第四部分 政治的族性和民族维度

Ethnicity(族性):从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	259
族性迷信与历史的意义	265
自决权的三种形式	272
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定时炸弹	279
“肯定性行动”与机会均等原则的 艰难平衡	284

第五部分 政治的法律维度

美国宪法的形成:一个历史的考察	297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略论	311
马歇尔与美国最高法院权威的确立 ——从马伯里案谈起	325
美国宪政史上的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	332
美国早期宪政史上的联邦法令废止权	341
保守理念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以 1889—1937 年的联邦 最高法院为中心	353
吉迪恩:一位改写美国司法制度的小人物	379
在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	386
新闻自由与个人名誉的艰难平衡:美国 媒体中的诽谤诉讼	390
凭什么独立的法官比民选政客更有权威	403

第六部分 政治中的个人、政党、社群与学术

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追记李慎之先生	413
克林顿的政治人生与性格缺陷	424
布莱尔和英国工党的与时俱进	433
英美两党制的比较研究	439
从负责任的公民到负责任的全球公民	444
对社群概念的进一步讨论 ——与许纪霖先生对话	453
想像中的西方与真实世界中的西方	457
有那么一点儿科学,又不那么科学的科学	462
学术腐败、学术违规与学术期刊的中国特色	465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注释规范 ——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 与评价数据规范》的批评	469
一套书 二十年 三代人	479
纪念一项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事业 ——为《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写的墓志铭	484
历史学家的责任和重大历史题材的写作	492
现代化理论评介	501
当代史鸟瞰	507
被误解的马基雅维里	510
后记	514

第一部分

政治的国际制度维度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理论

在当前西方学术界,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非常流行。实际上,最早使用这一研究方法的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它提出的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一语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至今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传统中,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和大卫·李嘉图探究的都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只是到了20世纪初,经济学和政治学才开始日益专业化,逐渐脱离成为互不相干的独立学科。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在西方有了复兴和发展。学者们开始认识到经济学与政治学各自的抽象模式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鸿沟,理论变得更为玄妙,但却更不现实了。学术界有人开始怀疑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分野是否妥当。

这种反省也反映了不断变化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这一变化日益表现为:(1)世界经济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课题,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合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各国间政治上的相互影响和经济上的互相依存逐步加深;(3)各国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的界限趋向模糊,国内问题国际化,内外难以有别。在这种变化面前,以研究国家利益、民族冲突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国际政治学已经无法提供满意的解释。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因而向经济学靠拢,试着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考察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进而创立了一门新的国际关系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或

称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①

应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把国际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但它毕竟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因此对它的理论核心,或用时下流行的话说“理论框架”是什么,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论。概言之有二元经济论、世界体系论和霸权稳定论等三种观点。本文将要评述的就是代表美国国际关系学主流的、影响较大的霸权稳定理论(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一、霸权稳定论的提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也是霸权稳定论的始作俑者。他在《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1971)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稳定论。在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研究中,金德尔伯格认为大危机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责任,停止“让你的邻居当乞丐”的以邻为壑的政策,特别是无人愿意充当阻止金融危机蔓延开来的最后借贷者的角色。因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定者”(stabilizer),它的责任在于:(1)为剩余的产品提供一个市场;(2)保证资本流向可能的借方;(3)在金融危机下银行关闭的紧要关头,作为重新启动金融的最终借贷者而发挥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的主要教训是,世界经济想要稳定,就必须有个稳定者,有一个稳定者。”后来

^① 这一领域中的代表作有 C. 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 Y., 1970; S. Strang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Mutual Negl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6(1970), pp. 304—315; R. Keohane & J.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1977; R.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 1984,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1989; R.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 Y., 1986; J. A. Frieden & D. A. Lake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N. Y., 1987; R.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1987; C. Kindleberger,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ssays on Financial Crisi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Cambridge, Mass., 1988。国内对这一理论的评价只有倪世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年第1期;刘同舜为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译本写的序和任东来为该书写的书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和霸权稳定论》,载《世界政治与经济》1991年第6期。

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者。他还把稳定者的责任又增加了两项:(4)维持国际汇率结构和(5)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另外,他还在第一项责任中增加了与别国分享短缺资源的内容。^①

在经济学上,金德尔伯格的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是公共产品论。所谓公共产品是指“个人、家庭或公司在消费这种商品时,不会减少其他潜在的消费者获得这种商品的数量”^②。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亚当·斯密在《原富论》中提出的。他认为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公共产品,即安全、正义和公共工程。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发展了这一概念,把社会安定、稳定的国民收入及再分配、政府对企业过度行为的控制政策等等都算作公共产品。金德尔伯格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国际经济学当中,把各国的民族利益看做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全球产品(cosmopolitan goods)。他曾专门论述了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的内容。首先是和平,其次是开放的贸易体制,统一的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③一个社会的公共产品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但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只有那些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国际上的公共产品。金德尔伯格甚至认为“稳定者”的五项责任就是一种公共产品。^④

稳定论的政治学基础则是有效政府论。正像凯恩斯从大危机中得出结论,政府应干预市场一样,金德尔伯格也在研究大危机中认识到大国应该承担起维护国际市场的责任。他从18—19世纪欧洲政治发展中得出结论,没有普鲁士王国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德国;没有撒丁王国带头,意大利也不会走向统一。因此国际经济的真正稳定需要一个世界政府。但在尚无条件建立这种政府的情况下,该由谁来担当领导呢?“小国没有经济实力,同时也不负有维持经济体系的责任,因此没有任何必要行使领导权。”它们只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搭便车者”(free

① C.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1973, p. 305. 另参见该书1986年修订本。

② C.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r” (1978), C. Kindleberger,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 186.

③ C.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1985), *ibid.*, p. 133.

④ *Ibid.*, p. 4.

riders)。中等大小的国家虽然“足以损害这个体系,但却不足以稳定它”,因为它们的行为好像自己是无足轻重的小国一样。只有大国既有能力又有责任来领导国际经济体系,1914年以前这个大国是英国,二战以后则是美国。金德尔伯格不喜欢政治学家用霸主(hegemon)来称呼这种领导国。在他看来,霸主是“随心所欲地去干”,而领导者则“是基于道义的熏陶和所处的地位不得不而为之”^①。因此,他认为这种领导作用是利他主义的,创建和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对一个国家来说纯属支出,获得的只是不可名状的领导者的“特权”。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能否承担稳定国际经济的责任,主要取决于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金德尔伯格的稳定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那些对国际经济的政治含义感兴趣的政治学家们的注意。他们开始把这一理论系统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实力与跨国公司》(1975)一书中,他从现象的解释、领导权的实质和国际经济结构的确定等三个方面发展了这一理论。吉尔平没有直接涉及稳定本身,而是试图解释国际体制(regimes)——或者说那些指导国际经济关系的种种规范(rules and norms)——的出现和变化,并着重吸收了公共产品这一概念,并用一个更像政治学名词的词语——集体商品(collective goods)来代替。

与金氏不同,吉尔平从民族利益方面来说明大国的霸权(领导权)。在注意到各国都从国际经济体制中获益的同时,他强调霸主获益较多。英国和美国之所以在其霸权鼎盛时期建立并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是因为它们的收益大于支出。当这种收益不敷支出时,霸权国便会放弃这种领导。与金氏按国家经济实力大小来确定国家地位不同,吉尔平则使用政治—军事实力和生产效率双重尺度。在他看来,前者主要表示一个国家影响国际经济体系力量的大小,后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利益与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关系的密切程度。一个国家的效率越高,它从自由贸易中的获利就越大,也就越愿意支持这个体系。在据此确定的国际经济结构中,他归纳了三种国际角色:边缘国(peripheral states),

^① C. Kindleberger, "Hierarchy versu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986), C. Kindleberger,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 157.